

关于文化的社会学反思

张 允 熠

文化人类学者往往从人的自然形态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探求一个民族的文化渊源，这固然不失为一种索根求本的科学方法，并渗透到考古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去，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它也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所张目，希特勒的“日耳曼文化至上”论便是这一谬种的极端形式。中国自明代中叶在与欧洲人种的文化交往中，始有中西学之对垒，进而演为中西学之争。“原来中国几千年所接触者——除印度文化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文化为中国人所独有”，^①但从鸦片战争后，欧洲人用他们的“物质文化——洋枪、大炮、火轮船轰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这时才意识到在地球的另一方，还有一群具有高度文化的人类的存在。同时，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者所鼓吹的“西方文化优越，东方文化落后”，“白色人种是优等民族，黄色人种是劣等民族”的谬论接踵而来，更使国人痛心疾首、咬牙切齿。从此，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索。然而，“好古”的习性难改，无法抑制黄色人种对自己所创造的传统文化的迷恋，先秦、两汉、盛唐的灿烂余光，时常感召着他们做起“中国文艺复兴”的美梦。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导致对中国人性的反思，于是忧伤者有之，忌愤者有之，呐喊者有之，醒悟者有之，疯狂者有之，逃遁者有之……于是又有“改造国民性”之说，于是又有“文化救国”之说。总之，一百多年来的文化反思，表明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努力从民族文化回顾的视角中去寻找中国近现代之所以积贫积弱的原因。

但是，什么是传统和文化？传统和文化在社会变迁中居于何种地位，它的前景如何，本文对此作如下思考：

一、文化是分层次的系统结构

什么是文化？广义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②较狭义的文化可以包括整个上层建筑；更狭义的文化仅指意识形态。这样，社会文化系统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最外层是物质文化，包括人类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切器物、精神产品和技术（物质发明和技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人所共睹，本文在此不作详细分析）；中间层是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人际关系、习惯行为和规范行为；最低层是社会意识，包括人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此外，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作为社会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泰勒的文化定义，其特点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所获得的能力”，从而把文化放在群体互动的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氛围中来考察，使文化作为社会学的一个范畴，为社会学家了解、分析人类的行为提供了一项工具。我们通常意义上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往往指人类精神生活中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对于物质文化这样一个大的系统，本文不拟探讨。

的细微部分，如文学、艺术、音乐及哲学的涵养和创造等等。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不但包括这种精神生活中的细微部分，而且包括一个社会群体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整个生活方式。由于社会行为本身存在着差异，致使适合于群体性的主流文化之外，还往往存在着次级文化（Subcultures）。悠久而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世代相因而形成所谓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影响着现代人的行为，并产生了只是社会许可或期待的行为。总之，特定的文化产生在特定的民族群体聚居的自然地理条件之下及其社会心理的环境之中，是一种分层次的复杂的系统结构，它也可从以下三种系统的层面上体现出来：

（一）信仰系统 它是由人与实体（reality）即主体与客体的相对关系中涵演出来的。它包括三个系统，即自然、社会、上帝的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关于天、地、人“三才”的知识。对于天地的认识往往分化为两极：远古人类在自然的威摄下，由对自然的畏惧到对超自然力的崇拜进而到对上帝的信仰形成了原始宗教；古希腊的智者困惑于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神秘莫测，执意要用智慧的灵光去探照其中的玄奥，寻求人与自然实体的次第关系，这就是初级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渊藪。尽管当时科学与哲学是浑为一体的，但却发出了近代文明的响矢。在西方，对天地的认识经历了自人出发而走向宗教和科学的两极对立，从而形成了西方宗教与科学的文化传统。中国则不然，中国的先哲们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对天神的求索完全是个远离现实的玄学问题。荀子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是要人们放弃对上帝、天神的信仰，而役万物为人所用。这就把开始对天地上下两端的求索用“中庸之道”的方法归之于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文化传统。重自然，还是重社会？是“信仰理性”，还是“实践理性”？东西方哲人发出的这种似乎对立的文化先声，实际上是根于各自的文化土壤而产生的一种自然选择的功能效应，在这里，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优劣界限。

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宜根据它的信仰系统的性质而定。从这个层面上理解的文化，实际上是个宗教、哲学、科学综合的知识体系。

（二）人格系统 人格是一个人的品格及其价值的总体，社会人格的自我完善往往表现为对一种理念的追求，形成理想系统。例如中国文化的人文特征，无时不散发着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其实，中国文化是一种极缺少信仰的文化，如果有信仰的话，这种信仰便是“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儒家如此，道家也是如此。它涉及到道德秩序、价值观念、对群体行为的价值判断和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审美意识。如道家的“道”是种最高的精神境界，儒家的“礼”是一种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而“仁”则是一种伦理观念和心理结构，在价值判断上以“得道”、“行礼”和“为仁”为标准。所谓“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道”、“礼”、“仁”的和谐一致，即具有审美旨意的精神与自然统一、情趣与景致统一的特征。

在理想人格的实现问题上，从来就是儒道互补的。唐宋以来，逐渐合儒释道为一派，但儒家仍具有主导意识、群体意识和规范意识的社会功效。规范和价值本来是矛盾的，但又是不可分的一对理念和信仰的力量。价值是抽象的理念，涵盖着人们心理上向上追求并外化为标准的信力，而规范恰是从相反的方向上遏制于有损这种追求的社会行为，其限度以价值为准，并在客观上起参与社会控制的作用，形成一系列具体规定。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是中庸和谐、天下为公，并附之以忠孝节义、仁智礼信等，这些组成了古代封建社会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系统，这是正向的。但是，从反方向上，它又是一组规范系统，用来束缚人们不忠不

孝等逆反行为。再如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民主与科学，民主鼓励人们参与决策的过程，科学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反之，它也参加社会控制的过程，涵演出一系列行为规范，以保障民主和科学的社会地位。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来，一直作为正向价值的理想系统和作为反向规范的控制系统发挥着指导、束缚人们行为的社会效用。

(三) 习惯系统 不同的文化产生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涵演出不同的文化，其差异性显而易见。天然的差异形成了各种文化特有的习惯系统。所谓习惯，即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这种相对处于稳态的结构世代相因，通过人们的行为需要保留下来。它又可分为三个子系统：

1. 语言、文字 语言的产生是文明的曙光，表明了人类思维力的形成。文字是语言的物质符号，它使本具流动性、变动性的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相对稳定下来。语言、文字是习惯性的文化标志，一个群体讲何种语言，书何种文字，通常表明他们隶属于哪一种文化类型。语言、文字既然是思维的产物，同样也体现了思维的特征。如中国的方块字，具有形象（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特点，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古老传统（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古老的活文字）、审美情趣（书法艺术）、辩证逻辑（字体结构本身及用字造句时所强调的对仗、对偶、押韵和朗读技巧上的阴阳顿挫等），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内守执着（背了四千年的沉重包袱，至今无重大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即是通过这种原始文字为工具世代相传至今。可以说，每一个方块字都是一个遗传基因。与此相反，西方的语言文字以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形式传播着西方文化，体现了西方思维的特点。拿拉丁语言系的文字为例，这是一种表音文字，比起表形、表义来说，表音文字是文字发展史上最进步、最有利于传播和交流的文字形式。它书写的流畅和字法、句法结构的缜密，给人们以一种严整的逻辑力量的感染，体现了西方人擅长于形式逻辑的思维特点。

2. 风俗 由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人文条件形成的人群风尚叫做风俗。风俗相沿积习，形成传统，历久不衰。如婚俗、葬俗、礼俗、乐俗、食俗、住俗乃至衣着装束和性行为等等，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差异很大。由于风俗的差异，对待同一社会行为，不同的民族有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如中国人认为“礼多人不嫌”，而欧美人却认为繁文缛节和过分的客套寒暄惹人讨厌。未婚少女怀孕生子，在许多社会群体中被认为是种不名誉的事，但有些民族中，却被认为是证明一个妇女是否有生育能力，然后决定是否能够结婚的例行手续。不但在社会舆论上能获得正面评价，而且社会还为非婚生子女提供价值观念上的保障。

风俗虽然处于文化结构中的较低层面，它却是旧的习惯势力的混凝土。每次社会变迁的到来，最难触动的文化外观层面便是风俗了，所以我国古籍《诗经》上就有“移风易俗”之说。近代社会学家也注意到了“俗”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明末王船山先生顶痛心‘俗’，他曾说过一句话，非常深切动人。他说：‘恶莫大于俗’。这是很值得我们深切反省的一句话。”^①当然，王船山所说的“俗”不仅指的风俗，还有庸俗的“俗”字的含义，诸如官场上的阿谀逢迎，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相互利用等，皆是俗不可耐的流弊。可见“俗”字确是社会变迁和现代化的阻梗之一。

3. 民族心理结构 民族心理结构是民族文化中积淀最深的深层结构，民族心理素质乃为传统文化的遗传心理基因，它的外在化便是民族精神。作为一个民族的群体意识表现出

^① 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乡村建设》第四卷，第七、八合刊。

来的特性通常又称民族性。民族性是一个中性概念，为同一民族的人群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二、传统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冲突

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世界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任何传统文化，不论它如何执着和保守，最终都要流动和变迁，稳定只是相对的，不稳定是绝对的，随着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力量、政治体制结构的改变，尤其是人与实体、生产者与生产对象的相对位移，群体的观念意识、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各个层面势必也要随之改变，这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 社会流动造成文化流动。社会流动是水平层面的人群位移。在古代，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生产，如游牧民族的民族大迁徙。其次是战争和商业。战争也会造成民族迁徙，每一次战争之后，都会引起战争双方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增加了不同民族文化上的接触，故使社会流动与文化流动相伴而生。例如，公元前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古代犹太人在同古代巴勒斯坦人的战争中，就从对方学会了制造和使用铁器并建立了以色列——犹太国家。再如，古代拉丁民族是个粗野、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但是它在对地中海沿岸文明古国的历次战争中，吸收了埃及的文学、科学、建筑和造形艺术，拮取了两河流域的拼音文字，数学和天文学。当然，战争也会带来对文化的巨大破坏，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讲的，主要是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社会文化的交互流动。

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拉丁人用武力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五百年间，犹太人创立的基督教很快传入了西方，从而对欧洲的文化 and 民族心理素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也开始伸出了交流的触角。我国的丝绸经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远销于罗马帝国各地，我国史书中正式记载了罗马帝国的外交使节和商人来华的史实。军事、商业、外交上的交往，使我国的知识界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下邂逅了西方文化，如罗马建国的故事便被司马迁无意识地写进了他的《史记》。由此可见，任何有生命力的文化机制孤立和封闭只是相对的，而交流和开放却是绝对的。

(二) 社会变迁带来文化变迁。社会学家把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常常放在同等意义上使用。社会的内涵是文化，文化的机制是创造，文化的创造者、载体和传播媒介是社会的人，刻意划分社会变迁与文化变迁的差别是十分困难的。国外社会学家多采取复合的称谓，即社会文化变迁 (Social—cultural change)，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如中国古代每当改朝换代之时，就有“改正朔，易服色”之举即是从政治和典章、礼乐制度的文化层面上着手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建。与此同时，文化的各个层面也随之发生变迁，即使那些因袭已久的习惯传统，从对历史的回顾来看，变迁也是显著的。例如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短短几年间做了三件大事，其一是推行郡县制；其二是统一度量衡和各国文书；其三是焚书坑儒。这三件大事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创举，除焚书坑儒具有破坏性之外，其它两件事对秦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再如南北朝及南宋时期的二次汉族的大迁徙，促进了对江南和岭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国文化的重心也随之南移。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语言学家惊讶的发现，在汉族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古代汉语的发声、发音少到了最低限度，而在江南，尤其在岭南的客家人中，却保留了最大限度的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这种

巨变，在一两代人中是感觉不到的，但在世代相连的历史长河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此为一种渐进性的进化过程。在文化结构中的习惯系统中，有时也有些令人惊恐的突变。鲁迅先生曾以剪辫子为例，说满人入关后，强迫汉民服满装和扎辫子，因抗拒和不服从被杀的汉人不计其数，直到民初有人写到这段历史时仍然称其为“国耻”。但到了辛亥革命时，革命军要剪辫子，不少汉人却又珍之如命，认为“身之发肤，受之父母，安能剪得？”辫子终归是剪了，却并没有恢复起明代的发髻，而是留起了东、西“洋头”。满服也算是废弃了，但也没有恢复起明代的汉装，而是穿起了经过改进的满服和西装。这一切变迁，在社会心理上获得了平衡。它又一次表明真正封闭、真正保守、永恒不变的文化系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难以生存，每一次社会变迁，都是一次文化的“蝉脱”，扬弃的是它自身的蛰赘，而获得的是新文化的诞生。

小团体的次级文化在社会变迁中的意向性也是不容忽视的。次级文化多半是小团体与群体之间的隔离机制所造成的。这种隔离机制在个人与团体之间往往表现为“逆反心理”现象，在两代人之间则为“代沟”。实际上，次级文化可以包括文化的所有层次，它的主要特点仅在于它存在于相对狭小的空间范围和相对闲暇的时间阈值内，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几乎都离不开次级文化的精神补充。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青年人中的次级文化往往向两极发展，一极作为一种破坏机制形成反文化（Counter—Cultures），另一极则发展为社会期待，一跃而登大雅之堂，由次级文化融合到群体意识之中，成为主流文化。其实，许多主流文化一开始也是次级文化，如东方的京剧，西方的芭蕾舞，再如目前可供期待的“迪斯科热”和“牛仔裤热”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三）变迁中的“忧患意识”。我们现在的文化研究热，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目前，研究的节奏又一次加快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研究的热潮如此紧迫呢？五十年前，梁漱冥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历史到近百年来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那就是因为世界大交通，让我们这老的文化国家，从来在文化上优胜独尊的，遇到一个不同的、新鲜的，也是很高的文化的西洋人在这时候到东方来，两下里相逢以后，我们即被包围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受到各种刺激、压迫，不能不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至少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到今天犹变之未已，今后还在要完成这个转变”。^①这就是“忧患意识”在文化研究上的折光。伴随着这种“忧患意识”的是心理上的惊慌失措，“从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心理，很快地为西洋之实际的优胜打击无存，顿尔一变为虚怯之极。”^②这种心理状态与孔子当年对周代文化传统没落的感喟有相通之处。受儒学陶铸的中国旧时的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关头，出于惊慌或是由于急功近利，遂使这种心理深层的沉淀物跃然泛起。“忧患意识”，不仅孔子和儒家有，老子和道家同样有，忧患中的道家遁世——激流勇退，忧患的儒家则是入世——激流勇进，可见，“忧患意识”本身就有二重性，在整体上却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文化的正负两极。

（四）变迁中的文化冲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因素是一切社会文化现象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终极原因，但是恩格斯说，如果把经济因素看成唯一的决定因素，最终将会陷入毫无意义的空谈。言外之意是说文化反过来也可以决定经济。罗素（Russel）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原因，要最终解

① 梁漱冥：《二十年国庆纪念》，《乡村建设》第六卷，第二期。

② 梁漱冥：《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乡村建设》第六卷，第九期。

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问题，必须从研究中国文化入手。^① 罗素的结论为当时某些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中国人所深为赞服。

“比较文化”在当代又称为“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Research），“跨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的理论特点是反对脱离社会文化整体来谈经济，认为社会深层文化结构，即群体意识的心理结构（或称潜意识结构）左右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决定着人们对现实的选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社会的经济生活。这与国民性研究中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的提法是一脉相承的。对社会文化结构的三大层次即物质层、制度层和心理层，抬高心理层的作用，把价值观念和潜意识行为看成是“文化之魂”，把“心理积淀”看成是中国积贫积弱和一切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还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形成根本的对立，其实质是应用了弗洛伊德（Freud）的心理——精神分析学说的理论。如果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们把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理解为“社会冲突论”的话，那么，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命名为“文化冲突论”。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给中国的“文化冲突论”下一个“彻底唯心主义”的定义，因为持这种观念的人，谁也没有说过“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样一句话。实际情况是，这种理论的产生在目前的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理由有三：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人民的温饱基本得到了解决，物质文化生活相对丰富起来，这使得一些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们对文化的兴趣日浓，对经济的兴趣日淡。正象一位作家，在饥肠饿肚时从事写作，想到的是能喝上一碗“经济汤”，吃上一块烤山芋，而在酒足饭饱后从事写作，希望的是在书桌上的花瓶里最好能插上几束含苞欲放的玫瑰花，借以欣赏她的芳容和嗅到她的馨香。当然，从事文化问题研究的人并非都有这种雅兴，以上举例只是说：经济力量促使人们把目光移向了深层文化；二是政治生活及民主化的重建，制度的日趋完善，社会秩序的相对安定，激活了学术自由研讨的气氛，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三是对外开放的实行，外来信息流的冲击，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比较研究的参照系，这是比较文化研究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指出，这几年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从两个方向递进的。其一是从器物层（物质文化层）开始，然后相应地变更制度层，最后这种客观存在反映到人们的观念上，导致深层文化的变动；其二是通过电视、广播、书籍、通讯系统等交流媒介以及人口在这两种文化间的流动，传递另一文化的信息，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观念，而后带动社会制度和器物的变迁，物质流、信息流、人流三种载体，承载着外来文化的信息，撞击着中国民族文化，^② 这是文化冲突论的由来。

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并非尽是冲突，也包含着一种互补性的内在动力，从互补用来研究变迁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结构，比起单一型的方法来说，似乎更能发人深省。当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不是本文的任务了。

三、多元文化发展的整合性和一体化趋势

社会文化由于根植、凝聚于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从开始便在形态和内容上呈现多元化的景象。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向，文化也渐显出其整合性

^① 罗素：《中国之问题》。

^② 聂莉莉：《跨文化研究与对外开放》，《文汇报》，1986年5月23日。

和一体化的趋势。在整合性过程中保持其多元的特征，在多元发展中趋于整合，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多元性表现为文化的差异性。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宗教、政治和伦理价值，不同的价值观念规范着各个群体的社会行为和对社会期待作可行性的选择，从而在整体文化上洋溢着不同的风格，形成不同的传统。地理环境是形成差异的中介，差异本身又是造成维护不同文化体系使之成为独立定型的隔离机制。文化隔离机制通过自然、社会、心理的作用使文化在社会变迁中再次分化和重组，最终得以凝聚而不被瓦解。人类历史上因自然地理条件曾形成过四元文化圈，即古希腊文化圈，地中海沿岸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国文化圈。在这四元文化圈中，古希腊文化以崇尚民主和科学为传统，地中海沿岸文化以追求信仰为传统，印度文化以解脱自我为传统，中国文化则是以反求诸己为传统。这种大致的描述仅限于“轴心时代”（公元前1100年——前200年），事实上，世界上极少有绵亘数千年而稳定长存，世代不变的文化传统，四大文化都经历过传统的断裂、分解而重新组合的情势。中国的儒学在世界文化史中最为源远流长，但自“五四”运动后，尤其到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也出现了断裂。正因为有着这种断裂，才有试图修补断裂带的文化认同的“寻根热”和重建儒学的“新儒学热”；与此相反，则是上文提到的“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说，这种提法，类似佛教法相宗的“阿赖耶识”的“种子识”说和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以德”说，即认为文化尽管在形态上以多元化的姿态流动变迁，但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绝对观念，它象一粒种子一样沉埋在民族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多从激烈批判和否定的角度对待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从审美情趣上去看待它时，才有存在着的价值，否则，只能是压在民族肩背上的、负载了几千年的沉重包袱。这种观点与“寻根热”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容易诱发出“全盘西化”的极论。

其实，以上两种见解只是对“批判继承”方法的两极分离，一极强调继承，可以称继承派；一极强调批判，可称批判派，都没有解决好对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遗留已久的难题。造成以上情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定程度上多元文化的差异性给人们造成的心理眩惑。就拿儒学来说，儒学本身也是个多元的复合体，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程朱、陆王等都各有互不相同的学说和价值观，但在各自时代的水平上，代表了儒学精神。我们今天所讲的儒学，应该包容这些人的全部学说，其对文化的制度层面和群体规范意识发生重要影响力的，在先秦是孔孟；在两汉，是董仲舒；宋以后至明清，则是程朱。有人会说，所谓儒学，乃指孔子本人的学说。即使如此，对同一本原始儒家的经典的阐释，在不同时代勾划出不同的孔子脸谱。其中有董仲舒神学化的孔子，有李弼玄学化的孔子，有程朱理学化的孔子，有陆王心学化的孔子，在近代，还有康有为“通天教主”的孔子以及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心目中洋化了的孔子。摆在继承派和批判派两大派面前的是多元化的儒学和多脸谱化的孔子，如果不加分析，急功近利的或取或舍，必定造成心理眩惑，而得不出科学结论。另外，在社会群体意识，社会主导意识和规范意识中，究竟哪些是“传统文化的心理积淀”，究竟哪些要素是活在人们心里的孔子思想？至今恐怕还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翻开原始儒家的著作，凭心而论，除少数专家以外，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他们的师长和父辈，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读得懂？更不用说“学而时习之”了。任何作为群体意识和规范意识的文化，离开教育的媒介是无法流传下去的，教育无外乎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再凭心而论，在我们的教育内容中，是传统的东西多，还是西化和现代化的东西居多？是孔子或儒家的思

想占主导地位,还是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做定性、定量分析而只是一种模糊概念的话,如果对这些问题得不出有利于自己的立论的话,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传统文化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群体意识的指导意识和规范意识呢?难道说“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不成?可能有人会说,除教育的渠道以外,还有行为方式的遗传,人际交往的感染,但这究竟是社会学的问题,还是生物学的问题,倘难定论。即使是社会学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定量分析,也难求得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文化研究热”中,特别令人惊讶的是,有些青年人,第一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陶冶,第二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过认真系统的研究,第三没有对传统文化在群体意识和社会行为中的表现做过细致的社会调查,然而他们却成为向传统文化开战的猛将,这是不是在隔膜意识作用下多少带有本能的排同现象?

各种文化系统无限复杂的差异性,首先应该表现为变迁过程中的单元分化或单体繁殖,如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世界三大宗教内的教派林立,现代马克思主义阵营内的理论对立等,都是这种单元分化或单体繁殖的证明,其结果必然是文化信息量的增加。拿自然科学为例,现代物理学中的知识百分之九十都是五十年代以后出现的,以前几千年中只掌握了百分之十。再如化学,现在人类所认识的化合物已达九百多万种,五十年前只有一百万种,1880年才只有一千二百种。假如有一个化学家想看一下这九百万种化合物。他一辈子也看不完。现在全世界每天都要发表科学论文六千到八千篇。一个科学家坐下来什么事也不干,至少要花上十年的时间才能看会这一天的论文。现在的世界已非五十年前的世界,现在的中国也非五十年前的中国,更非一百年前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变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以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当代世界的各种文化知识系列已由单元分化到多元分化,由单体繁殖到多体繁殖。强大的文化信息流把我们包围在狭小的空间,使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再也不能就文化论文化,而要把目光移向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制度结构的层次上来,否则,则不可避免的重蹈前辈文化研究者“文化救国”论所走的弯路。谈到社会组织结构,人们发现,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包括生产组织、整合组织、政治组织、科层组织以及婚姻、家庭、人口的结构和人际关系等,都与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偏离,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现实主义者。历代中国封建统治者都是打着孔子的招牌布大政于天下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实践中真正实现孔子的理想,也没有按孔子的价值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行为,至于广大被统治者更是不知孔子为何物,反孔的农民起义几乎代不乏出。封建时代尚且如此,对于在现代多元文化包围圈中生活的当代中国人,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仍抱着一个千载不易的“心理积淀”而拒绝前进呢?

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所造成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压力的氛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走向“趋同”即一体化的整合方向。几乎每一个国度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开始的进程都具有适应和不适应的二重性。中国的现代化刚刚起步,就有“忧患意识”的爱国之士表露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冲突的耽心。但是,只要他们回顾一下当代工业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这种忧患意识便会减轻许多。七十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悲观派”们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认为,工业化造成了能源危机、粮食危机、资源危机、人口危机、家庭危机、教育危机……总之,现代化造成了文化危机,如不立即着手解决这些现实的几大冲突,到2100年,人类就会崩溃。“罗马俱乐部”的见解,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学家们的注意和重视,因为他们并不是信口胡说,而是在对资料、数据采用电子计算机分析整理后得出的研究结论。1973年爆发的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使更多人开始认真对待他们的预见。与“悲观派”相反,出现了

“乐观派”。“乐观派”的代表就是《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他嘲笑“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是“带电子计算机的马尔萨斯”，他自己则对工业化的未来进行了“乌托邦”式的描绘。这一切，在实质上反映传统与现实、文化与现代化相冲突在群体心理上的作用。六十年代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曾被人们误解为是现代化的标志，其实，它恰是一种反工业化的次级文化形式。“嬉皮士”看上去好象不要传统，其实，他们表现的内容是对现实的厌恶，他们要求返朴归真——回到大自然中去，流露了对更古老的传统的留恋。这一切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现代化是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势，但现代化的进程也会带来些反文化的副产品，如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控，以及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异化”作用等等。时下掀起的“文化热”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广阔背景下展开的，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交联，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不会重现欧美的情形，但类似“悲观派”、“乐观派”的群体意识和类似“嬉皮士运动”的次级文化形式却已显出了它们的端倪，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那么，欧美的前辙，我们是否可师之以鉴呢？实际上，多元文化的交叉互动，客观上发挥了整合机制的作用，呈现出社会文化一体化的发展前景。因此，我认为，所谓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学和西学的提法，应该做为哲学、文学、美学、史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历史文化现象，而不应该提到现实的高度统而论之。作为文化体系中的某些层次，例如习惯性文化系统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可行的，而从整体上加以区划是不适宜的。道理很简单，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不是封闭的孤立体系，它不仅擅于吸收外来文化，如在古代对印度、阿拉伯乃至对古罗马某些文化成果的吸收以及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即可为例，而且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开放的机制，如日本及东亚各国、西亚及欧洲等地区都多少受到过中国古代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说中国文化是封闭性的文化从来就是一种缺少根据的主观臆说。

“文化热”是根于现实而生发出来的一种带有群体意向性的研究热潮。如果脱离社会实际而流于抽象的漫演，最终势必绎为玄学。因此，研究文化必须要重视滋生文化的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群体、社会组织的有机结构和社会对文化的期待。在当前加强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繁荣民族文化，以民族文化为核心，兼收并容各国文化的优秀成果，这是实现文化整合和一体化的宏观战略措施。然而，措施的实施不是依靠人为机制强行的，而是只有在整合与一体化的过程中，保留各文化系列的个性特征，通过百家争鸣、学术民主和创作自由的途径，通过调整社会组织结构，完善社会制度层次，增强社会控制效应的可靠保证，才能谱写一首民族文化大发扬的共进曲，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

“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分析，对西方文化也要分析。我们既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也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东方文化论是错误的，全盘西化论也是错误的。我们一方面要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一方面要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应该自己认识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综合东西方文化的贡献，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①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林国灿

^①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展望》，《理论信息报》1986年6月2日。